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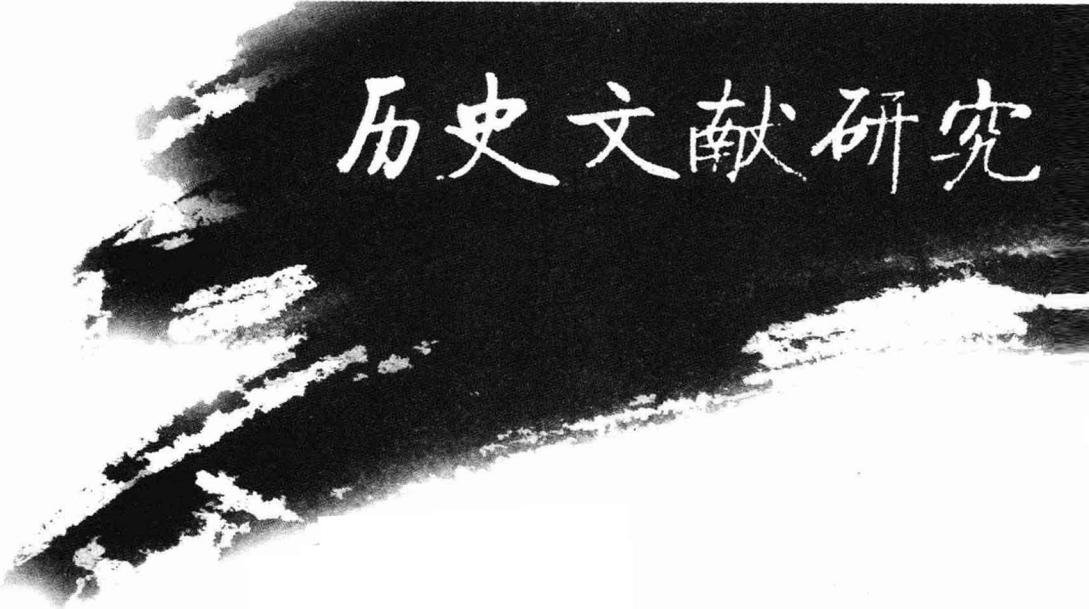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32 辑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总第 32 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历史文献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32 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675-0757-9

I. ①历…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丛刊
IV. ①K2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4543 号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32 辑)

编 者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主 编 周少川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俞 跃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3.25
字 数 43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1100
书 号 ISBN 978-7-5675-0757-9/K·387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1	中原古国文化论	孙顺霖	陈协琴
10	《过秦论》的历史意义	施 丁	
13	墨子的和谐理念刍议	杨 昶	
19	晁错“纳粟授爵”与汉文帝军功爵制度改革	周美华	
33	程颐《论语》诠释探微	唐明贵	
42	张齐贤及其《洛阳缙绅旧闻记》	耿天勤	
48	《许衡集》版本考	毛瑞方	
59	高拱《病榻遗言》性质新探		
	——以隆庆六年六月“庚午政变”为线索——	任 昉	
72	浅论吕坤《呻吟语》	诸伟奇	
77	《洛学编》探析	王记录	许二凤
91	孙奇逢《孝友堂家规》源流考	赵 振	
100	《入陇琐记》中的民国豫西	周生杰	杨 瑞
106	白寿彝先生佚文三则	吴建伟	
118	从清华简《楚居》论荆楚之立国		
	——兼论夏商周时期对南方之经略——	郭伟川	
135	《管子》经济观新探	周怀宇	
146	《史记·天官书》校补	王永吉	
155	郑玄《毛诗传笺》与“以史证诗”传统	郝润华	王燕飞
167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语言描写艺术	张 婷	李晓明
176	杨亿著述考	许 琰	

185	朱长文散考三则	陈志平
194	论宋代士大夫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启示	张全明
204	宋代“私史之禁”起源献疑	王盛恩
211	张之翰《西岩集》点校整理札记	邓瑞全 孟祥静
214	明人宋史撰述的断限与纪年	吴 漫
221	明代通俗丛书的社会生活史价值	孙新梅
228	《红楼梦》在满族文化研究中的价值	王 硕
240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易图说》校勘研究	汪受宽 安学勇
250	《青照堂丛书》所收《南华通》非屈复撰考	李 波
258	王柏心经世思想初探	董小梅 周国林
265	桐城派之莲池俊秀	
	——政治、学术、教育三界的跨越	许曾会
276	《郎园读书志·经部》辨证	蒋鹏翔
284	清代泉学典籍的繁兴及其主要类型	潘胜强
29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文献学价值述略	霍明琨
300	经学元典“五经”的历史思维	汪高鑫
316	略论方志古迹志的演进	黄燕生
320	古籍辑佚与汉语史研究	陈东辉
331	传统婚俗中的狐臭禁忌考论	李 峰
340	三十年北朝史学研究述评	韩 杰 彭洪俊
360	历史文献学思想：一份亟待总结的学术遗产	
	——读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	肖炎明

中原古国文化论

孙顺霖 陈协琴

【摘要】 古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文化,它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并引导着人类文明的走向,促进着人类的发展、变化,并固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之林的坐标。中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历史中国的缩影,所以研究中国古国文化必经中原。

【关键词】 中原 古国文化 研究

—

国的出现和国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人类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他从一来到世间,就与周围的人群结成不同程度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进入到复杂、庞大、无法逾越的社会关系网之中,借以生活、生存、发展、展现着自我,发展并完善着自我,并凭借着自己的知识、智慧、劳作等,在社会这座大舞台上,演绎出一幕幕生动的话剧。特别是当人类进入原始社会中后期时,更是如此,无一例外。这时,国作为统系着一个或众多族群的社会单位,起着组织、协调、放任或约束、指导或支持个人或集体在国家的范围内,在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前提下,去发挥技能、施展才华,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财富,积累人类文明。

所以,国,从制度上来讲,是一个、多个民族群落通过某种形式组成的有一定地域范围和国民群体结合的行政区划单位,它由国都、界域、国民等诸多因素所组成。《诗经·小雅·节南山》云:“秉国之钧,四方是雄,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周礼·天官·太宰》:“以佐王治邦国。”注曰:“大曰邦,小曰国。”另外,古代国都也称国,因系国之统治者和国家统治机器集中于此;诸侯封地也称国,因为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分封的亲戚,勋

臣或上古先王后裔于天子国都之外的土地为君,以屏蔽或维护国家,帮助天子治国安民,完成税赋徭役以供国家,《周礼》中云:“凡言邦国者,皆是诸侯之国。”古时地域也称国,《周礼·地官·掌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顺便提及的是,古时天子、帝王自称国或国家,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子、帝王是一国的最高权力支撑,特别是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朕即是国”,是不允许动摇的。

国家的形成是十分复杂的。除原始社会早期人类为了生存,为了同大自然斗争,自觉结成原始狩猎群体之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众部族推举德高望重者为酋长,组成一定的指挥体系,组织、领导或带领部落成员去进行生产、生活斗争和维护部落利益的争战。这恐怕是原始公社解体后,通过一定组织形式形成的部族国。二是在部落的残酷斗争中,强胜弱,多胜寡,靠战争、掠夺而形成由血缘和亲缘组成的氏族邦国。这种情况在奴隶制社会中后期十分普遍。三是氏族邦国为了保护本氏族的既得利益,在广大的国域内,分封其子、弟、亲戚、忠于自己的勋臣武将、古王之后裔等为诸侯,准其独立建国,修建国都,组成军队,设立政权管理机构,独立组织生产、生活等活动,定期向王朝贡献赋、役和土特产等。这在中国夏代中后期至周代特别突出。四是被氏族邦国驱之边远地区或留居邦国之内、后来顺从邦国天子的其他部落邦国,有的还从边疆迁回内地建国,与天子分封的诸侯国起同样作用的诸侯方国,这在商代后期至周代十分普遍。五是改迁或移迁的诸侯方国。六是靠武力兼并、消灭其他诸侯国而逼天子承认其诸侯地位的新兴诸侯国,如春秋末韩、赵、魏之形成等。七是靠政变、阴谋篡夺或征讨而建立的新国或诸侯国,商汤灭夏,后羿、寒浞代夏,武王代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争,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等,特别表现于封建社会的全部,有时甚至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

二

“中国”,在古代既是一个地域概念、国家政权组成单位,又是后人对其的认识观念物。“中”,一般指方位在中央。《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颖达传:“于地势正中。”《新书·属远》:“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为“中国”,而把周围我国的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汉书·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春秋之后,又泛指中原各诸侯国。《韩非子·孤愤》:“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所以历代不

少都在寻找“天下之中”，周代建立后，武王派周公营洛邑，周公在河南登封建测影台，定洛阳之南为天下之中；隋唐以后，中国的疆域扩大，又测定河南汝南为天下之中，并人工堆积天中山以记之，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题之“天中山”三字犹存。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也泛指中原地区。唐陈子昂诗：“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指此。古时的中原一般指黄河中下游的陕原以东，山西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因河南省位于这一地区的中心，所以又称河南省为“中原”。历代“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即指此。加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洛阳、郑州、安阳、开封、淮阳等地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数十个朝代于此建都，“中国”也一度成为这一地区的代称。

自夏代以后，国内不断自然形成和封侯的氏族方国、诸侯方国，史有记载或考古查有遗址的多分布于中原地区，河南省就今行政区划的县市来看，几乎是无县（市）不国，而且一县多国的现象所在多有。这些历史遗留的古文化，使河南省成了古代中国的缩影，厚重的河南历史文化，几乎与“中国”之称相符，与“中华民族摇篮”、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称相符合。

三

据《史记·三代世表》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汉书·地理志上》云：“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帝行天下，方制万利，划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调万国’，此之谓也。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分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即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这里说的黄帝建“万国”，似不是确数，是“众多”的代词或形容词，加之远古时，“国”之概念不清，恐系众多原始部落或氏族部落之意。再严格地讲，原始古国不过是国家下面的行政单位，众小国只是些聚落村庄，大国才有城邑。

自夏禹建夏代，传位于子启开“家天下”以来，在“九州”之内，自然存在和天子分封的氏族方国不可胜记，见于史籍的就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斟灌氏、彤城氏、有穷氏、有仍氏、昆吾氏、皋陶氏、有熊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斟过氏、英氏、六氏、龙氏、豢龙氏、羲和氏等等。到夏代后期，分裂出来的氏族方国更多。商汤灭夏后，曾分封过四方列侯统带八百小诸侯，所以有“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之说。

周武王灭商建国后的八百多年间，不断分封诸侯，“以藩宗周”。周代到底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史书记载不一。《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云：“殷以前尚矣。周封

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汉书·地理志上》称:“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子遗者矣。”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迁至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历之后,见于春秋。”《汉书·诸侯王表》中说:“昔周监于二代,三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

看来,“千八百国”与“八百国”差之甚多,疑《汉书·地理志》中有衍文错记。即便是“八百国”,在周代的地域内,也可谓是“遍地皆国”了。

秦代“不立尺土之封”。到了汉代初,立二等之爵,“王”、“侯”而已。《汉书·诸侯年表》中记:“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诸侯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城边数十,宫制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汉初,曾封过十八个异姓王,但那是出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至汉文帝之前,异姓王不是被杀,便是被降为诸侯。王爵封国就只剩下六十多个刘氏的子孙兄弟王,实现了“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的誓言,但是,刘氏王朝所封的同姓王、诸侯却多如牛毛。分其种类有“功臣诸侯”,有“王子诸侯”,还有“外戚恩泽侯”等。仅西汉二百年所封王、各类诸侯竟达千余。中间虽经文、景帝分邑、削藩,但只是扬汤止沸,并不治本,以致诸侯、王或拥兵自重,或不朝不贡,或任意征伐兼并,或结帮拉派反叛朝廷,最后终被王莽所篡,西汉灭亡。东汉中期,诸侯的分封更滥,几乎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后期,那些盘踞各地、掌握重兵的诸侯任意称王,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头来天子被废,逼其“禅让”,东汉灭亡。

综上所述,上古迄于汉代,历朝分封的诸侯,少则数百,多则千余。名为拥卫王室,实则成了动乱之祸根。无论是同姓王侯,或系异姓王侯,概莫能外。

四

夏、商、周三代,河南位于中原腹地,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他周围、域

内,存在着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国。每朝初封之时,恰似一颗大树一样,显得是那样干粗根深、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但过不了多久,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或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便不断蚕食、争斗,甚至攻伐、兼并,连年不休。这样,新的诸侯国不断出现,加上在王朝内任要职的大臣无不想“分一杯羹”,天子不得不在畿内划出大片土地分封给大臣们作为“食邑国”,以缓解日益突出的内部矛盾。天子的土地、势力越来越小,于是不得不仰诸侯的鼻息,严重的时候还受诸侯的欺凌,甚至老王去世,为了埋葬,还不得不派官员到几家大诸侯处“求赙”,可见当时诸侯国之多、势力之强大的状况。

然而,当时中原腹地河南的大片土地上,到底存在着多少诸侯?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区域的变化、文字发展的缺失、史籍传承的散佚等,谁也难究其详。以现在河南省的行政区划而论,就有史实可查的为准,大概有一百多个。随着考古发掘的进步、地下古都遗址的不断出现,又发现近百个史籍缺失但实际存在、古文物铭文可证的诸侯国。这样使存在于河南省境内的上古三代的诸侯国达到二百余个。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史书偶尔提到,但查无实据,又一时无历史文物可证的一些诸侯国,也不包括过去曾属河南,现行政区划归入周边省份的一些诸侯国。

但就上述原则而论,在河南境内的诸侯国约占诸侯国的一半左右。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国为例,曾被司马迁《史记》列为“十二诸侯年表”的,河南境内占七个,分别为郑、管、卫、陈、蔡、宋、杞;战国“七雄”中,在河南省境内的就有韩、赵、魏和楚前期及楚后期。这样,历史铸造了河南深厚的古国文化,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整个民族发展的中原文化的重要支撑。而且这一文化有源有流、有脉有支、有发展有变化、有高峰也有一度的低谷。且有史可查,有实物可证,根系相连,从无断层。

周以后的各代,秦无尺土之封。汉兴后,将秦二世而亡的不封诸侯列为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封了一些异姓王和同姓王,诸侯国更是五花八门、遍地皆是,在河南境内的就有一百多个。但汉代的诸侯王不少未就国,仍居京城;也有不少诸侯国与郡混同,使诸侯国仅仅成了封君的食邑。加上汉爵只有王、侯二等,异姓王废除后,同姓王各据一方,经过几次削藩、分地,不少同姓王的后代实际上已降为侯,而且领地越来越小而不再称“国”。汉以后各代,虽都封了不少王侯,但多有名无实,只不过是安慰而已,也不是有实际权利、拥有军队、官僚机构的“国”。所以,本文指的“中原古国”,一般指夏、商、周三代形成或所封的方国,总数为一百八十二个。

五

古国文化之所以称其为“根系文化”,因为他不是孤立的,是中华民族多种文化的

共同承载体,并且以其独特形式,诠释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古国文化又集中体现在古都文化上。古都是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中心,一个古都,是一部历史,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缩影。

早期或初级国家的都城,有较大的城邑为中心,周围有小城、居民聚落和土地环保,是一个领地不太大却不很确定的诸部族的政治共同体,其断代时间约在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这就是诸多专业学者称之为“酋邦”、“部落方国”、“古邦国”、“古方国”等,这应是中国古国或古都文化的第一阶段,或称之为“初级阶段”。此时已出现“文明萌芽”或“文明曙光”,标志着人类社会已步入文明社会门槛。从已发掘的远古方国都城遗址来看,多数都是比较原始的。城墙以堆筑为多,夯筑较少;城池常建于原始村落环壕的基础上,平面多呈圆形、椭圆形或圆角方形;面积一般不大,多在一平方公里以内;城内建筑多以祭坛或大型礼仪建筑为中心;出土文物多以建筑陶瓷片、生活陶器、石器、骨器和较少的铜器,部分陶器上描绘或刻划有原始族徽、记事符号等,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宗教、文化、建筑、手工作坊的原始状态。

上古时期的古国都城,重点表现在中国历史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划分约距今 4100 年至 2200 年。这时,我国已出现统一的奴隶制王朝,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社会的文明时期。奴隶制王朝为了巩固其最大奴隶主的统治地位,便将大量的中、小奴隶分封于全国各地去建立诸侯方国和众多氏族邦国。全国犹如一株参天大树,粗壮的躯干是最大奴隶主“天子”,上面分出的大小枝丫是中小奴隶主,枝丫上附着的幼芽嫩叶,则是众多的平民和奴隶,靠他们日夜不停地呼吸劳作、吐故纳新,摄取大量的阳光雨露去滋养枝丫和躯干。这时的诸侯国很多,按亲缘程度和功劳大小,分封给不同的爵位,形成了大国与小国。大国者一国数城,如周初分封的齐国“兼五侯之地”,卫国“地四百里”;小国则一国一城,地只“三十里”。古国多,都城就多,上古的都城较远古都城有很大的进步。城池建设平面基本固定为方形或长方形,有双城并列或分内外二城;城内建筑以宗庙为中心,有许多大型宫殿遗址、祭坛遗址和手工作坊遗址;建筑布局紧凑,已形成沿中轴线向外散布。宫殿建筑已较明显分出朝殿和后寝殿;城池规模扩大,大国都城面积在 10 平方公里以内,最大者可达 32 平方公里;城内街道、坊的规模已见雏形;出土文物以精美陶器、大量青铜器、金器、骨、蚌器为主,且冶炼技术先进、形状生动精美,不少青铜器上还有铭文,记载了主人身份和吉祥语,与史实印证互信;文字由刻划记事符号向记录史事、传达信息过渡,象形文字形成;大型宫殿和祭坛遗址一般都有人牲奠基坑,贵族古墓中曾有不同殉葬人、牲及生前使用的大批精美器皿和特制的礼器、明器陪葬,反映了“视死如生”的宗教及礼法制度;城池、宫殿建设设施趋向豪华,出土的瓷砖、排水设施、水井等屡见不鲜;手工作坊的玉、铜、金、骨、石器

的原件及半成品残件标志着制作工艺的水平和极高的审美意识,不少作品以今天的先进制作工艺和水平也难以复原等。

中古及近代的古国都城,以王朝都城为最大、最精美,诸侯国次之,郡县更次之。因为现有不少古城留有原貌或不断续建仍保留一定的规模。这些又非本文介绍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里只好从略。

综上所述,认识和研究中原古国文化意义十分重大。从历史意义来讲,它记录了民族五六千年发展、壮大的轨迹,并以实物展现于世界,使中华民族成了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青史永存。从经济意义来讲,它印证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由初级到高级,由原始到现代,一步步奋斗,一点点积累,逐步走向繁荣昌盛,为今天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和难能可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意义上讲,它是各个时期创造出不同文化的集中体现,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促进了民族的发展与繁荣。从城市发展意义上讲,它无论从形式上、规模上、布局上,还是从设计上、建筑上、装饰上、审美意识和实用价值上,都提供了范例,展示了时代特征的文明程度以及科技发展的状况,它以时代的引领性、注入的文化品位铸造了建设的根与魂,对于我们今天实行的发展城市经济不无借鉴。当然,研究古国文化还有更广泛的意义,比如人文发展意义、根脉文化意义、姓氏文化意义等。姓氏文化是中华名族在繁衍发展中逐渐形成、定位并至今不衰的独特文化现象,古国与姓氏紧密相连,据姓氏学家的研究,中华姓氏中“以国为姓”,并由此发展、延伸的姓氏约占姓氏的60%以上,其次是以“职官为姓”。另外,以地为姓中,绝大部分也与古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古国文化是一门综合文化,展现了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天文、地理、人文、社会、建筑、冶炼、工具、制作、医学、农业、科技、教育、商业、礼制、丧葬等领域里文化佳品,成了一个让人永远也参观不完、领悟不透的庞大博物馆,是一部令人爱读、永读的大百科全书。

中原古国是古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集中区域,因此,深入认识、研究中原古国文化,对于了解、探究中国古国文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原古国的封与建,年代久远,文献失记者所在多有,故难确述其数、其地、其代。不少古国,在延续过程中,又受历史诸因素影响,不断迁徙、更名、改封,以至出现一国多名、一名多地、一地多国的复杂纷乱现象,大者如周,有东周、西周、成周、周王城、二周城等;小者如申、吕、谢、梁等。以至很难考证或述一国时,不得不出现重复考证的现象,虽在行文上看似重复,但是应属正常的情况。

幸赖近百年来考古学兴起,地下文物发掘日臻科学,不少古国文物纷纷出土,以实物补充文献之缺失、记载之舛误。特别是一些新出土实物资料,使人眼前一亮,以确切

的实证,补写了中华文明史,使中华文明史的诸链条,连接得更加紧密、牢固。但是,考古毕竟是一门新学科,近百年所发掘的成果仅为中华民族五六千年文明史中之一的部分,就古国文化来讲,要说得清楚、论证得科学,尚待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证明。这需要大量的时日,恐非吾辈所能及矣!

这里论述考证的古国(文献、遗址两部分),名为一百八十二个,实其中关联古国名者甚多,约共二百四十余个。然而这二百四十余个,绝非中原古国的全部,估计只能算半数左右。要想搞全,期待贤者。

周初至春秋时所封的淮河流域诸国,如江、道、黄、弦、沈、房和南阳诸国的邓、襄、吕、谢、缙等,现址在今湖北境内均可以找到遗址。所以,不少学者将其中不少古国列入湖北境,这是不明史实变迁所致的误断。类似这些古国的始封地及主要存国年代均主要存在中原地域,只是到了春秋后,楚国逐渐强大、穷兵扩掠,先北上灭中原小国、后东扩淮夷联盟诸国以争霸权。时间从公元前701年北扩到公元前622年东伐的一百多年中,楚国共灭国五十余个。一般情况下,楚先期的灭国战斗中,摄于其他大诸侯的军事压力,还实行迁其国、扶新君的策略,如许之三迁、蔡侯迁吕地等。到中后期霸业初成时,便撕掉伪装,肆无忌惮地灭其国、杀其君、置县,将后代逼迁之荆山一带,以臣属自己。这样,楚地的房、襄、樊、邓、曾等邑才应之而起。清代治《春秋》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列国地形口号》中有一首“楚灭国诗”,概略地指出了入春秋后楚拓土扩疆的方位及顺序,同时也说明了因时间久远、史籍湮灭,考证某些西周封国被灭原委的困难,现录于后。

楚先北向后东图,
申吕随唐实首途。
汉水诸姬吞灭尽,
征诸传记半模糊。

我们研究中原古国文化,当然首要的是介绍、推荐中原古国文化的深远、厚重,研究其在中国古都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但同时也是在探讨中国文化的根脉、发展和作用。研究古国文化,必须得尊重史实和事实,不能想当然,也不能主观地以今论古、以今套古、以今证古。因为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古国一国多名、多地的现象所在多有,有相互关联的,也有风马牛不相及的;古国名延续至今的不少,在历史发展中屡有更改,甚至面目全非的也不在少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史实为基础,广泛求证,才能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否则将会贻笑大方,甚至会亵渎史书,遭历史的唾弃。有

时,还必须使用“二重证法”,利用不断出土的文物、遗址的实物证据,去印证史实,才能做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孙顺霖,河南省电化教育馆;陈协琴,中州古籍出版社)

《过秦论》的历史意义

施 丁

【摘 要】《过秦论》是一篇历史宏文,其意义在于抓住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紧扣人民的存亡安危,指出民心顺逆是政治成败、一代兴亡的决定性因素。告诫为政者要以史为鉴,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

【关键词】 民心 存亡之由 以史为鉴

《过秦论》是贾谊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历史论文。称贾谊是历史学家,就因他写有这篇超越前人史识的文章。此文主题是批判秦朝政治,而核心思想是论秦失民心而亡。此论分上、中、下三篇,都是特写秦失民心问题的。

上篇论的是,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生气勃勃,经几代多人努力,及至始皇,终于并吞诸侯,统一天下,威震四海。于是征越、驱胡,焚书愚民。贾谊指出,始皇之心,自以为江山永固,可称帝万世。然而平民陈涉起而反秦,“天下云合响应”^①,于是众起而“亡秦族”。

秦能战胜六雄而兴,却亡于“谪戍之众”。如此“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贾谊提问又作了回答:

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仁心(或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很注意历史之“势”,即历史变化的终始、盛衰、攻守、成败等。此“攻守之势异”,是言秦夺取天下至守固政权,势已变异。“仁心”,《史记》作“仁义”。“仁心不施”,是指对民不施仁义,即不爱恤百姓。换句话说,秦因不顺民心而亡。

中篇对于上篇提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秦灭周,兼并诸侯,称帝天下,“天下

^① 本文引文皆出自贾谊《过秦论》,见贾谊《新书》卷1,四部丛刊本。

之士，斐然向风”。就是说，秦兴是受到士民欢迎的。为什么？贾谊说了：因为天下混乱已久，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百姓太困难了。如今秦并诸侯，一统天下，“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百姓觉得秦统一天下，可以安身立命，好好地活下去，对秦朝寄予很大希望。秦王于此时，本应“专威定功”，给民心以满足。

然而秦始皇违背民意。他“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史记》作“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以为，这种施政方针和政策很不对头，指出：

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其意是，并兼诸侯时，可以“高诈力”，而安定天下则当“贵顺权”，取与守不能同一个办法，不能一意孤行，而不顾民众安危。秦不能于取得天下后改道易辙，那就非常危险，“故其亡可立而待”。

秦二世即位，天下士民“莫不引领而观其政”。二世当此时机，本可有所作为，争取新生。故贾谊指出：二世本可“正先帝之过”，改变暴政。还说：

(可以)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擎污秽之罪，使各返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待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史记》作“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史记》作“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民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这是贾谊高明的政见和史识。二世如能如贾谊之意，即改正始皇之过，关怀士民，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满足万民愿望，则天下必然安固而弭暴乱。

然而二世不是如此，他“重以无道”。作阿房宫，(修骊山墓)，“天下多事”，繁刑严诛，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不收恤。士民人人穷苦自危，所以陈涉起事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贾谊由此得出结论：“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务在安

之而已。”欲巩固政权而保天下,只有尽心尽力于“安民”的方政策和措施。秦二世之过,就在于仍是危民而不能安民。

下篇论子婴继二世而立,仍然执迷“不悟”。他在山东已乱、章邯要市于外的情况下,本可“案土息民以待其弊”,但实际上不能这样,“秦俗多忌讳之禁”,天下之士噤若寒蝉,“阖口而不言”,秦朝就在“百姓怨而海内叛”的情况下垮了台。于是,贾谊作出结论: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他提醒人们,要总结与汲取历史教训,若要天下安定,必须因时施政,此处未用“安民”一词,然已深寓其意。而其前提与条件,显然是民本也。

贾谊的《过秦论》这篇历史宏文的历史意义,是在于:(一)以“民本”思想为核心。民心顺逆是社会安危、政治成败、政权兴亡的决定性因素。(二)论一代兴亡。抓住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紧扣人民的存亡安危。(三)警告人们以史为鉴。历史是有情的,她无私地告示于后人: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因贾谊有此篇宏文,我确认他是历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

(施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